改革開放40年 富強中國 惠及世界

膠片見證時代變遷

光影閃耀幸福人生

鮑利軍：影業變化是國家發展的一個縮影

小人物 大時代

1939年出生於浙江諸暨的鮑利軍，1960年從寧波電影訓練班畢業後，於第二年進入當時的諸暨縣電影公司電影放映隊。在娛樂缺乏的上世紀70年代初，看電影帶給人們極大的精神享受。每次放電影會提前三天公告，於是人們每天都眼巴巴地盼着電影隊來，放映當天，連生產隊都會提前一小時收工，讓大家早點回去準備。在鮑利軍看來，電影放映方式和觀影環境變化，也是改革開放40年來國家發展的一個縮影。 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俞晝 特約通訊員 吳海軍 浙江紹興報道

■鮑利軍向香港文匯報記者介紹他的檔案櫃。 香港文匯報記者俞晝 攝

“當時整個諸暨縣只有9個電影放映隊，所以放電影都是一個點一個點輪着來的。”電影隊來一次不容易，通常會帶兩三部影片，一氣放完，看完電影都到夜裡一兩點了。”鮑利軍說。

當時都是在露天放電影，人們都會自帶小板凳去佔座位。晚上的電影，中午場地上就像龍門陣一樣擺滿了板凳和磚塊。“那時候看電影的條件很差，夏天被蚊子咬，冬天被風雪吹，你能聽到一陣陣的跺腳聲，夏天是為趕蚊子，冬天則為了取暖。”鮑利軍介紹。即使是這樣，每次放映都能吸引方圓十里的群眾。“至少有兩三千人，地上、樹上、房頂上，只要能看到屏幕的地方，都擠滿了人。”鮑利軍說，即使每次搭台的時候，都會給放映員象徵性地劃出一小塊工作場地，但人潮湧起來，被擠倒也是常有的事。“我一倒，屏幕就黑了，然後趕緊爬起來，來不及拍掉身上的土，趕緊繼續放。”鮑利軍笑着說。

拉車步行 前往山區放映點

作為電影放映員雖然工資不錯，但每天趕場子放映也十分辛苦。“那時候一個放映隊就四個人，所有的設備來回都要板車拉，每個人手掌上都是厚厚的老繭。”鮑利軍說，不管春夏秋冬、酷暑嚴寒，都要馬不停蹄地從一個放映點趕往另一個放映點，路遠的要走上大半天。

有一次，鮑利軍被安排到山區裡放電影，路途實在太遠，他借了一輛雙輪車拉上放映設備往山區裡趕，結果從沒拉過車的他，翻了三次車。鮑利軍說：“每次一翻車，趕緊檢查設備是不是受損，就這樣日夜兼程趕了14個小時才走到了那個放映點。”

“我記得剛開始電影票是成人五分錢（人民幣，下同），兒童三分錢，按照身高來劃分， 後來慢慢地漲到兩毛錢一張票。遇到熱門電影，買票的隊伍能排出幾條馬路去。”鮑利軍笑着說，進入大禮堂就輕鬆多了，不用日曬雨淋趕路，也不怕放映機被摔壞。

“放映機也在不斷更新，從甘光F16型放映機，到移動式35毫米放映機，後來改裝成大功率氙燈座機。以前還需要專門有人不斷地手搖發電，1962年開始用上了新安江水電，只需要換換膠片就行了。”據鮑利軍介紹，像這樣的放映點，整個諸暨約有60多個，人們再也不用趕幾里路去看場電影了。

上世紀80年代初期，鮑利軍的小兒子鮑鐵勇初中畢業，像當時很多中國家庭一樣，鮑利軍選擇了離崗退養（未到法定退休年齡提前離崗），為兒子“騰出崗位”，由兒子頂班進了放映隊，接過了父親的工作。就這樣，放了23年電影的鮑利軍調去了諸暨姚江區文化站，開始了對家庭檔案編撰整理的工作。

“那時候都這樣，孩子大了沒工作，一般就是父親或者母親選擇提前退休，把‘鐵飯碗’傳給孩子，有些歷史久遠的工廠甚至一家兩三代都是這樣頂班換下來的。”鮑利軍解釋說。沒想到，隨着電視的興起，對電影造成了極大的衝擊，電影事業開始進入一個衰落期。

到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，人們去電影院看電影的興趣越來越淡，有時一場電影只有十幾個觀眾，大部分電影院經營艱難，各單位電影放映隊紛紛撤銷。

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，隨着個體、私營經濟政策的穩定和從業人員地位的提高，不少政府機關、企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紛紛轉換身份，投身私營工商界，掀起了全民“下海潮”。

“我到現在還記得小兒子來跟我說要辭職‘下海’的情景，我的心情其實很複雜，一方面是可惜了好不容易爭取來的事業編制，一方面也看到了社會上的那種激情燃燒的闖勁，既然做電影不溫不火，不如讓他去試試。”據鮑利軍介紹，鮑鐵勇在後面幾年做過建築防水項目，又辦起了一間紡織廠。“如果算起來，他還是我們家第一個萬元戶呢。”

3D普及 票房再攀新高峰

時代變遷，媒介更新，電影漸漸地以另一種嶄新的面貌展現在人們面前，數字影像取代了笨重的電影膠片，電影院可通過互聯網從電影公司獲得數字電影拷貝，然後用數字放映機放映。“看電影”從高潮到低谷再到高潮，經歷了一個輪迴。數據顯示，隨着改革開放40年來國家各項事業的發展，全國電影總票房也呈現出快速上升的趨勢，自2012年起的170.7億元增長至2017年的559.11億元。

就在這幾年，諸暨陸續建成了多家現代化數字化影城，3D放映廳甚至IMAX放映廳逐漸成為電影院的標配。“我也在孫子的陪同下去看了3D電影，坐着皮沙發，看着逼真的畫面，耳邊環繞着立體音響，確實感覺不一樣。”鮑利軍感嘆道。

22冊家庭檔案 濃縮68年柴米油鹽

走進浙江諸暨江藻鎮江藻村鮑利軍老人家，就像走進了一個微型檔案館，一本本日記簿、一幅幅老照片、一張張工資條……這些日常生活中再普通不過的東西，鮑利軍都認認真真地攢了下來，最後構成22本厚厚的家庭檔案，把一家人68年所經歷的歲月都濃縮其中。

憑結婚證領布票縫棉被

在鮑利軍的收藏裡，有一本專門貼着各類票據，包括十幾張全國糧票，以及油票、肉票、布票等等。“這都是好不容易省下來的，其它的早就用掉了。”鮑利軍說，那個時候這些票據比錢好用，沒有它們簡直寸步難行。

1955年8月25日，國務院全體會議第17次會議通過《市鎮糧食定量供應憑證印製暫行辦法》，糧票從此應運而生，此後，食用油票、豆腐票、布票等各種票證進入人們的生活，各種商品皆需憑票購買，中國進入長達30多年的“票證時代”。

就在鮑利軍與妻子的結婚證背面，香港文匯報記者還看到了一段小字“布票8尺、棉花2斤”，這都是當時憑結婚證才能領到的緊銷貨，專門批給新婚夫婦用來做棉被和衣服的。

“那時候每個月我一領到糧票，就跟家裡的戶口本放在一起，然後開始籌劃這個月的配給怎麼用，有沒有額外支出，再算下來每天能吃幾斤米，一個月能吃幾兩肉。”鮑利軍說，當時每逢周末或月底，糧店門前總要排起長長的隊伍，家中有小孩的，往往打發孩子前來排隊。快排到時，大人再拎着面袋趕來。人們總要小心翼翼地觀察秤桿的準星，生怕遇到缺斤短兩。買到糧後，再小心翼翼地紮緊口袋離去。

隨着改革開放深入、經濟發展、糧食豐收，全國逐步取消了糧食定量供應，至1994年全國各地基本取消糧票，票證時代徹底終結。“現在，不僅不需要票證，連現金也很少用，我看我孫子網購，在手機上點一點，就能把東西買回家了，變化實在太大。”鮑利軍說，現在他的孫子隔段時間就會給他們通過互聯網購買米和油，由快遞員送到家裡，不需要再下樓拎上來，非常方便。

“鐵飯碗”曾吃香 談婚論嫁佔優勢

■鮑利軍夫婦。 香港文匯報記者俞晝 攝

“34元（人民幣，下同）在當時是什麼概念？”鮑利軍回憶起自己剛工作時的工資水平，還是很自豪的。由於當時群眾沒有什麼業餘生活，盼的就是看場露天電影，所以電影放映員的工資也相對比較高。“那時候豬肉才6毛4一斤，麵5分錢一碗，鄉鎮幹部的工資也只有35.5元，所以我的收入算是中等偏上了。”

正是電影放映員的這份工作，讓鮑利軍收穫了甜美的愛情。“我家是三代貧農，沒有房子沒什麼地，就是因為我有這個國家的鐵飯碗，工作轉正以後就有人給我介紹對象。”鮑利軍回憶過去，臉上流露出羞澀又甜美的神情。鮑利軍說“我老婆年輕時挺漂亮的，也有很多人想給她介紹對象，最後她挑中了我，跟着我吃了不少苦。”

鮑利軍於1964年5月2日結婚。“婚房是租來的農民的舊房，給了女方家120元的聘禮，就把老婆娶回了家。”鮑利軍說，家裡除了一張床，沒有別的傢具，可以說是家徒四壁，我老婆也沒嫌棄我，用帶來的新被子鋪了床，就開始了新的生活。